

现实

YU WODE XUANZE

XIANSHI

与我的选择



杭州大学出版社

现实与我的选择

1988.12.

17

杭州大學出版社

现实与我的选择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

浙江星邦信息处理电脑有限公司电脑照排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12.25 印张 243 千字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 7-81035-097-8 / G · 041

定 价：4.90 元

中华英才的闪光足迹

荆平书

“五四”青年节前夕，杭州大学出版社推出《历史与我的选择》、《现实与我的选择》两部新著，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历史已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回顾过去，在我们的华夏大地上，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中华英才的闪光足迹。无论是老一辈革命家，还是新一代优秀分子，他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道路上，都创造着不平凡的业绩。尽管他们职业不同，经历各异，但无论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还是在严峻现实的面前，他们都把自己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祖国高于一切”，是他们共同的人生选择。

《历史与我的选择》和《现实与我的选择》堪称姐妹篇。前者生动地描述了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政治

家、军事家、科学家、理论家、作家、艺术家所走过的漫漫人生之路。当我看到他们忧国忧民的一片赤子之心，他们为祖国昌盛而奉献终生的奋斗精神和艰苦创业、呕心沥血的感人事迹时，不禁为之动容。从他们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学习到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后者则真实地展现了我国新一代优秀分子的精神风貌。他们大都成长在新中国的旗下，他们的成才之路，对广大的青年来说，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他们无论是远在异邦深造，还是在家乡的土地上耕耘，都把自己学习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们既有崇高的人生价值目标，又有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扎实作风，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我们祖国人才辈出的辉煌前景。

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宝贵的财富，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衷心地希望广大的青年朋友都能读一读《历史与我的选择》和《现实与我的选择》这两部新著；从书中介绍的这些优秀人物的身上，从他们闪光的足迹中，学会更好地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把握自己的人生航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自己美好的青春连接起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

目 录

- 韦钰之歌 闵 卓(1)
李双江：在阳光下歌唱 秦 杰(27)
驾着奋斗与命运的双轮
——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冯长根 徐仁杰 张宝瑞(44)
他摘下了“水果之王”的桂冠
——记高级工程师朱鸿云 张天来(58)
邓朴方其人其事 枢 文(76)
石家明的喜悦与悲哀 尚绍华(96)
画到生时是熟时
——记画家、服装设计家李克瑜 夏 欣(113)
让中国的卫星上天
——记卫星专家闵桂荣 顾迈南(135)

- 彭平安：创造幸运的人 叶俊东(146)
哦，神秘果
——记诗人周良沛 聂北茵(165)
- 何士光：在乡场上 冯瑛冰(182)
王震西：面向 21 世纪的思辨与探求 吴 明(198)
刘金宝：把握时机，主宰命运 言 理(214)
王永民：为了中国的头颅 吴会劲(232)
旭日干：须臾不忘报国志 郑庆东 汤 计 凌广志(252)
李润虎的几幕人生
——一个志愿兵的故事 王 石(268)
- 张开逊：爱和智慧交响乐 林俊彬(284)
李树楠：理想与命运冲突中的胜者 周 亮 李树梁(306)
她的中国心 徐福锋(324)
李爱琴：主角 冯瑛冰(344)
金庆民：把生命交给矿石的人 夏 欣(361)
为了你，祖国 傅惠民(373)

· 闵 卓 ·

韦 钰 之 歌

披着金色的阳光，她走来了——步履是这样矫健，似乎比年轻人快捷；双眼是这样明亮，丝丝白发也无损焕发的容颜。50岁，作为一名科学家，一位大学校长，正当盛年。

在这条不平凡的路上，她经历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选择。从少女时确定报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到成名后毅然转向新的科研领域；从是否出任校长，到确定如何办好这所社会主义的综合性大学；从思虑行政、业务能否兼顾，到全身心地投入，两者互相促进，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继

续奋进……

让理想插上翅膀

韦钰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当她带上红领巾时，学校里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老师说，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她代表我们祖国。旗上四颗小星代表人民，一颗大星代表党的领导。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长期浴血奋战，才创立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也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们应该热爱国旗、热爱红领巾。年仅12岁的韦钰和同学们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着。此刻，孩子们心中升腾起一种神圣的感情。这感情究竟是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许多年后，当韦钰在为祖国的科学事业顽强工作时，她突然明白了：这就是“责任感”。也许就是从儿时起，红领巾把她和祖国紧紧连在了一起。爸爸妈妈每天给她两分钱买油条，她却都省下来捐献给国家，支援抗美援朝；她还亲手绣了一颗红心，寄给保卫祖国的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叔叔。

在南师附中，韦钰度过了难忘的高中三年。这所中学师资很强，有的老师水平很高，是能教大学的，但他们还是坚持留在中学里，认真地从事教学。学生大部分都住校，每天以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寝，都有很严格的制度，老师晚上还来

指导学生自修。韦钰回忆说：“我就在国家给我们的这样好的学习条件下，打下了比较牢固的知识基础，培养了比较严谨的学习作风。”她所在的班是女生班，女同学不讲究吃得好，穿得漂亮，与其他男同学一样，以学习好为荣，以“三好”要求自己，成绩不比其他班差。韦钰在班上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她不满足于完成老师布置的、必须要做要交的作业，对一般同学认为可做可不做的思考题也认真去解。有一次，数学老师陶强先生教《平面几何》课讲到“轨迹”时，给同学们出了个思考题：“一只蚂蚁在地球上从赤道向北极爬，它在空间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韦钰和同学们一下课就议论起来，几个女生还蹲在地上比划着。直到天黑，才想起要去吃饭。晚自修后又在宿舍里争论，但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熄灯号响了，个个都上床睡觉，但韦钰在被窝里还想着题目，直到迷迷糊糊入睡。天快亮了，她猛地惊醒，答案出来了！她多么想对伙伴们大喊：“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但还未到起床的时候呀，只有静静地等候着。终于，起床号响了，韦钰才大声叫道：“问题解决了！”顿时，同学们围上来，要她讲答案。韦钰不慌不忙地比划着说：“地球以南、北两极为轴线在自转，一天转一圈。如果蚂蚁不动，那么它在空间运动的轨迹就是一个圆。而蚂蚁在地球上由赤道向北极爬，地球又在自转，一边爬，一边转，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螺旋线。就像沙发弹簧那样，下面大、上面小，弹簧之间的距离，就是蚂蚁一天爬的距离。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大家一起高喊：“对，对，对，问题解决啦！”

平日，韦钰和同学们最喜爱谈的话题就是“理想”。1955年除夕，在学校开完晚会后，韦钰和伙伴们踏雪回家，路上七嘴八舌地谈起各人毕业后的理想。还有一年就要告别中学了，姑娘们有的说：“将来要做地质学家”，话音刚落就唱起了《勘察队员之歌》；有的说要做医生，为病人服务；有的要当天文学家，观测天象。韦钰呢，她说，想要成为无线电专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学生韦钰有着丰富多采的生活，她爱读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以及鲁迅、巴尔扎克、契诃夫的作品都给予她很大的影响；她还演过童话剧，参加过航模制作、射击比赛……走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韦钰和同学们深深感到，是学校和老师，给她们插上了翅膀，给了她们追求理想的力量。1956年夏，韦钰和班上的同学都按各人志愿，考取了大学。从此，天南地北，迈上了未来建设者的征途。

经受工科大学的训练

建国之初，我们国家已展示了向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势头。无线电和电子学，代表着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韦钰怀着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考上了国内著名的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电真空器件专业，这时她只有16岁。

学工科是艰苦的，尤其是方兴未艾的电子学。在五年大

学生活中，韦钰刻苦地攻读各门课程。她生活在一个好学上进的班集体里，同学们把习题集上的题目统统做了，一遍还不够，做几遍；课堂上学的不满足，就找参考书看。做毕业设计的时候，碰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学生吃酱油汤、飞机苞菜（苞菜因缺肥料，叶子往两边长），许多同学都得了浮肿病。韦钰她们曾经为吃到一个烧饼、中秋节晚上能分到一个月饼而欢腾雀跃。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她们没有怨言，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发奋学习，努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为国家分忧。韦钰和许多同学在南工“金陵院”大楼的实验室里做毕业设计，那里的灯光夜夜通明！

南工，一向注意培养学生具有坚强的意志、健全的体魄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韦钰身感心受，一进校就被体育锻炼的魅力所吸引。每当课外活动时间，就去体操队。为了加大训练量，她在体育馆门前的几十级石阶上，上上下下，几十次、几百次，而且越跑越快。跑着跑着，韦钰的心越跳越快，气越喘越粗，满头大汗，腿几乎抬不动了。但她咬紧牙关，拼命向上攀，直到完成教练规定的运动量为止。以后是在高低杠上腾飞翻跃，苦练高难度的动作。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韦钰以优异的训练成绩获得了国家一级体操运动员证书。与此同时，她的功课也学得很好。大学毕业后，被选拔为我国第一批正式招收的研究生，在南工又深造四年。当时系主任陆钟祚教授等一批教师，肩负着推动我国电子学科发展的重任。韦钰是陆教授的研究生，也参加了一些科研工作，一起创建了南工电真空研究室（现在为电子学研究

所)。在这四年中，她所有的寒、暑假都是在研究室里度过的。早上啃着烧饼、馒头来到研究室，吃完晚饭，丢下饭碗又到研究室继续工作。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丰硕的成果，韦钰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行波管大信号混频研究》，得到了学者们的好评。在 1965 年 8 月，即使是在电子学研究方面居领先地位的美国，也只是提出了小信号混频理论。韦钰的论文不仅提出了大信号理论，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实验数据。经专家评定，她的论文具有世界先进水平。高教部科研成果展览会展出了她设计的行波管，国防单位都希望能尽快投入使用，并下达了机密级的研究任务，但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夭折。

新中国女博士的形象

十年动乱过去了，科学的春天在向人们招手。1979 年 2 月 7 日，恰好是韦钰的 39 岁生日，她和另外 49 位学者一起，乘着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了祖国。

慕尼黑机场，银燕翩然降落。

一群西德记者带着惊奇和质疑的目光迅速围住了第一次从人民中国去的大批学者。不一会儿，记者们把目光集中在人群中仅有的 5 位女学者身上，包围圈又一次缩小。衣着整洁、仪态娴静的韦钰闪烁着一双大眼睛，面带微笑，频频向记者们点头致意。她深深懂得：此时此刻，自己的言行举止

代表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她思索着，在这陌生的国度，自己能否完成预定的任务。

韦钰在西德首先需要攻克的就是语言关。她的德文在国内是靠自学的，基础本来不好，一到德国就到哥德学院攻读德语。但这所学院的学费太贵，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她只学了七个星期便就不再继续下去。到了西德第一流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高频研究所，语言不通成了她学习和工作的障碍。课听不懂，更无法进行学术讨论，有时还闹出许多笑话。她第一次去见指导老师杜林教授，教授发现韦钰的德语基础较差，为了便于她熟悉语言环境，就说：“你以后跟助教们在一起吃饭吧。”韦钰当时比较紧张，只听懂“吃饭”这个词，便急忙对杜林教授说：“不、不、不，我不是来吃饭的，是来学习的。”还有一次，韦钰有事要找校长的秘书。德文中的“副校长”和“笑话校长”两个词的发音相近。她跑到门口，看见有人出来就问：“笑话校长的秘书在哪里？”哪知问的正好是那位副校长，事后弄得韦钰很不好意思。

到底能不能闯过语言关？这对韦钰来说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外国同事对她也持有疑虑。因为在国外，妇女参加工作是少数，何况象韦钰这样快四十岁的女性，又是置身于电子学领域之中。可她的内心却倔强、自信、好胜，她想起临行前与陆钟祚教授的一段对话，不禁浮想联翩。

“假如我现在只有 29 岁，出去还能干点事。现在太晚了。”

“正因为‘文革’耽误了你们一代人的时间，因此，你出

去是负有历史责任的。我们等待着你学成归来。”

是啊，老一辈科学家对自己寄托着多么大的希望。我们中年人应该责无旁贷地挑起这付承前启后的重担。论学习，年纪是大了些，困难是多了些，但我相信一个人记忆力的减退是可以用勤奋来弥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她的勇气。

白天听课，凡是与专业有关的都去听，听不懂也去听。中午跟助教们一起吃饭，抓紧时间练会话。下午和同学们一起上习题课。晚上还和同学们一起做实验。回到宿舍仍要学习到深夜，用每月节约下来的十几马克的零用钱买的一台旧电视机练习听力，学习德语。一天 24 小时，她恨不得全用上，连走路的时间也不肯放过，总是背啊，记啊……

到了节假日，为了让德国学生帮她练习口语，她就帮助她们烧中国饭菜。相处熟了，她就请她们课前把新课文教她读几遍。这样，上课就容易听懂了。

四个月过去了，韦钰的德语终于过关。所里的同事和教授都很高兴，对她刻苦学习的精神十分钦佩。后来，高频所的同事在一起聚餐，就会联想起她刚来时的情景，揶揄道：“韦女士不是来吃饭的，是来学习的。”

一道关隘总算闯过来了。可对学电子学的人来说，不懂计算机就无法工作。韦钰在国内从未见过计算机，对它的程序和操作方法一无所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假期到了，亚琛工大外事局组织在那儿学习的 9 位中国学者游览西柏林。韦钰也知道外出可以开阔眼界，丰富生

活。但对她来说，当务之急仍是学习，韦钰决定利用假期掌握计算机技术，就婉言谢绝了邀请。杜林教授知道这件事后，很支持她的做法，并在外出休假前对韦钰说：“既然你要学计算机，这里有个题目，你拿去算。”这个题目，是杜林三十年前做教授论文的题目，他当时应用的是“小信号理论”，他希望这道题能运用“大信号理论”求解。杜林曾把这道题交给其他国家来的进修学者和一些学生做过，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使他满意的结果。韦钰接到这个题目后，就去请教另一位教授，问他该怎样学习计算机。那位教授说：“只有两个字——大胆。”于是她放弃了休息时间，每天学习和工作 12 小时以上，忙得顾不上烧饭，只是在下班的路上到食品商店随便买点东西充饥。经过三个星期的努力，终于过了电子计算机这一关。在这个基础上，她毅然采用一种不常用的坐标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杜林教授交给她的题目。同时，还解决了杜林教授的其他几个学生多年来所未能完成的单腔管大信号的研究课题。韦钰的惊人毅力和出色的成果，使得杜林教授刮目相看，他称赞这位聪明干练的女学者是“同行中的优秀者，是永远受欢迎的，是最好的合作者之一”。为了给这位有前途的中国女学者提供更好的深造机会，杜林教授建议韦钰把一般进修改为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韦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国家，担心延长留学时间要多花外汇，于是立即写信向南京工学院领导请示。学校及时复函，信上说：“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和学校荣誉的问题。哪怕再延长一年、

两年，你也要完成这个任务。”于是，韦钰把祖国的信任和关怀作为前进的动力，决定攻读博士学位。

在做博士论文的日子里，她日日夜夜地推导、计算，顾不上给亲人写封家信。由于过度劳累，鼻子大量出血，没有时间上医院，只吃几颗“六神丸”。有几次出血很多，累得到隔壁房间弄点冷水洗洗脸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坐在凳子上，把头抬得高高的，让血慢慢地凝固。也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韦钰身上又长了一个肿块，医生建议马上做手术。可她考虑到研究工作会因此半途而废，硬是靠吃些中药挺了下来。她全神贯注地刻苦钻研，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其他的一切。

就在论文写到关键的时刻，传来了即将召开第五届国际红外和毫米波会议的消息。会议规定，与会者的文章必须提前4个月报去，而当时韦钰的论文还没有全部完成。要不要报？能不能报？杜林教授没有把握。韦钰对自己是有信心的，她想，应该把自己的文章放在世界水准的天平上去称一称。为国争光的机会就在眼前，应该牢牢地抓住它。她勇敢地给国际会议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参加会议的请求，并把论文主要内容作了概述。会议主席回信表示欢迎她参加大会并作学术报告。对于这一决断，直到韦钰回国后，杜林教授在给她的信中仍这样说：“我到现在还感谢你——在第五届世界红外和毫米波会议提出你论文的勇气。”

在为参加会议作准备的日子里，她昼夜不停地写作，草稿纸和计算纸足有半个桌子那么高。经过8个月紧张而又刻